



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

王继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近代中国与 近代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王继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9

ISBN 7-5004-3957-1

I. 近… II. 王… III. ①中国-近代史-文集 ②文化史-中国-近代-文集 IV. 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7243 号

责任编辑 田 文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25 插 页 3

字 数 294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王继平，湖南双峰人，1957年生。1981年12月毕业于湘潭大学历史系77级历史专业，1984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1987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5年晋升为教授。历任湘潭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主任，人文学院副院长；现任湘潭大学研究生处处长、学位办公室主任，兼任湖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全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理事。是湖南省高校教师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历史学科组组长，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学位委员会文史学科组召集人。著有《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纲》、《转换与创造：中国近代文化引论》、《嬗变与回归：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意识和模式研究》、《幻灭与新生：戊戌维新与中国法制的现代进程》、《服饰文化学》、《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等，在《近代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2002年被评为湖南省首届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

自序

这是我的第二本学术论文集，收集了我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和近代文化史方面的论文。去年，我将我有关湘军和晚清湖南社会的研究论文结集，以《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为题，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出版这两本论文集，于自己而言，只是借此作一阶段性的学术总结，为20年的学术工作的纪念。如果居然还有若干读者，则是我莫名欣慰的收获了。

1982年1月，我毕业留校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当时，是由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崇汉玺先生担任我的指导教师。在两年多的助教工作期间，除了担任主讲教师的助教，辅导学生、批改作业以外，就是读书。崇老师指定阅读的书目，一是《资本论》（马克思）、《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论艺术》（普列汉诺夫）三本理论著作；二是中国史学会编写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共1500万字，几十巨册。在这两年中，我仔细阅读这些资料，并作了大量的笔记和资料卡片，这给了我较为深厚的理论和史料的基础，对我以后从事学术撰述以极大的帮助。1984年9月，我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时任湖南师范大学校长的林增平先生。在读研究生期间，我利用有利的师资和资料条件，广泛的阅读历史资料、游学问师，收获颇丰。林增平先生为人淡泊的心境，严谨的

治学精神，对我为人、为文以巨大的影响。林先生虽已作古多年，但他对弟子的教诲，使我受益终生。每当夜深人静，疲惫袭来，我便想起先生殷切的笑脸，随之倦意顿消，我又埋头工作。从1985年起，我开始发表论文，到如今，20年来共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15篇为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全文转载，20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历史学年鉴》、《光明日报》、《高校文科学报文摘》、《文汇报》等文献摘要、评述、引用；另出版个人专著6本。不敢说在学术上有多大的贡献，然而可以自信的是，在学术成为教授的敲门砖、官员的装饰品的今天，我还没有失去作为一个学者的本色，无论是作为一个专任教师在教学的岗位，还是近几年来兼任一些行政事务，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读书人，把学术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也从不追赶学术或世俗的时髦，始终坚持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我以为学术应当是学者存在的价值所在，是学者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在这转型期的社会，世俗的诱惑实在太多太多，我不敢自言能有多少，但我一直把握自己，不要失去学者的自我。

我出生在一个矿工的家庭，矿工的豁达、粗犷，赋予我为人 的豁达和宽容；我生长于一个不幸的年代，17岁高中毕业就开始知青生活，没有读书的机会。但是，即使是在下乡的日子，读书仍然是我惟一的爱好。每当夜深人静，我总是带着满身的疲惫，在煤油灯下苦读。当时能找到的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杨荣国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以及《鲁迅全集》，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读完的。知青生活的苦闷，在读书中消解。1977年12月17日第一次恢复高考，我是带着孝走进考场的。我的父亲于1977年12月15日去世。我未能告别逝去的亲人，在遥远的异乡，倾听着故乡悲送父亲的哀乐，我开始我的高考。回首往事，我虽然

一直为没有送父亲最后一程而抱憾，然而我 20 年来的工作，使我可以告慰父亲于九泉之下。完满的人生太少，人生的岁月有限，我已经过了人生的不惑之年，我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但我做一名学者的职志永不会变。

谨以此书纪念我 20 年的学术生活。谨以此书献给我长眠的父亲，献给我的导师林增平先生和崇汉玺先生。

王继平

2002 年 4 月 1 日于北京旅次

目 录

自序	(1)
城市市民与辛亥革命	(1)
民初第一届国会选举平议	(37)
略论少数民族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斗争	(51)
论孙中山维护祖国统一的思想	(66)
洋务教育平议	(80)
洋务运动与中国现代化	(96)
略论中国的近代化军事教育	(108)
论近代中国的文化传统主义	(123)
论近代中国的文化折衷主义	(136)
论近代中国的文化虚无主义	(151)
论晚清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型	(165)
论知识分子与农民政治	(189)
论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整合过程中的价值选择模式	(206)

晚清中国现代化思潮的文化视角	(241)
论现代儒学思潮与中国的现代化	(259)
论近代中国文化传播媒介的变迁与发展	(280)
论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文化的演进	(294)
论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整合	(305)
论西学传播与晚清学术变迁	(320)
多维视角下的近代中国教案与传教士	(340)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华文化活动的评价	(353)
论清末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	(359)
论史部目录体系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	(368)
评《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	(376)
《洋务思潮史论》简评.....	(380)
后记	(384)

城市市民与辛亥革命

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来的政治变更和革命斗争，都是以农村及农民群众的揭竿而起、攻城略地为主要形式。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起义，无论其成败如何，都是如此。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也是以农村暴动或在农村兴起为特征，随之向广大的城镇地区发展。只有辛亥革命，是以城市的起义和政治变动以及市民的参与为特征，达到推翻封建王朝，以资产阶级政权取而代之的目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特殊形式？这种形式对于辛亥革命的成败有何制约和影响？这就有必要对 20 世纪初年的中国城市及其主体——市民等级的地位、社会心理意识及其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及革命运动的关系加以探讨，从而说明城市市民等级对辛亥革命成败的实际影响。

—

辛亥革命为什么采取城市起义和响应及政治变动的形式？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探讨近代中国城市及其主体——城市市民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在联系，亦即探讨中国近代城市之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土壤的问题。

中国近代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有着与西欧不同的道路和特

点。西欧城市经历了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交的毁灭与重建的过程，新兴的城市成为人们逃避封建剥削的渊藪，并且逐渐获得了自治或独立的权利，城市居民形成了逐步摆脱封建关系的市民等级，并由此而孕育出资产阶级。而中国古代城市一直是统治阶级的政治中心，它的盛衰荣枯是与其政治地位相联系的。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不曾出现任何一个获得自治，摆脱了封建羁绊的城市”，在这些城市中，“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像欧洲一样的市民等级”^①。具有资本主义意义的中国近代城市和类似于西欧的城市市民等级，是 20 世纪初年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时期的产物。

从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渐次出现的中国资本主义，到 20 世纪初年才逐渐显示出独立的趋向。资本主义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资产阶级成为了具有一定经济实力、政治意识的社会力量。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城市为其发展场所，城市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基地，广大的农村则仍然处于前资本主义状态。根据资料统计，1895—1904 年期间，在全国总资本额和设厂数分别为 2814.5 万元和 143 个的资本主义企业中，上海、武汉、广州、杭州、无锡、天津等六个城市就分别拥有 1589.6 万元、厂矿 50 个，分别占全国总数的 59.7% 和 35%。^② 在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这种现象更为明显。仅江苏一省在 1895 年至 1913 年间，该地区的上海、无锡、镇江、苏州、南通等城市，厂矿数

^① 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载《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② 根据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下册第 654 页统计表累计，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就占全国总数的 23.48%。^①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格局，造就了一批新兴的近代城市，使它们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及资产阶级活动的主要基础。

资本主义在城市的发展，将城市居民卷入了资本主义的漩涡，从而形成了类似于西欧中世纪末期、与资本主义经济相联系，属于资产阶级经济政治范畴的城市市民等级。这是一个与西欧城市市民等级同质而不同时代的新的社会力量，他们中间，一部分已经具备了资产阶级的身份，但大多数尚处于向资产阶级转化或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联系之中，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网络中不可缺少的经纬。可以说，他们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在城市发展的结果，而他们的进一步扩大和成长，又依赖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从中国近代城市市民等级的发生渊源来看，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生存和发展，就与中国资本主义发生了不可分离的联系，也就是与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和革命运动具有着天然的共通点，考察城市市民等级各个部分即可得到印证。

20 世纪初年的城市市民等级，其成分包括商人、企业主、小手工业主和手工业工人、近代产业工人、士绅、中小职员和自由职业者及知识分子。在这众多的各色人中，企业主和一部分商人、官僚因为直接投资于近代企业而成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是城市市民的上层，本身与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此外，绅士阶层，即具有不同科举功名、在籍或候补、退休的官吏，居住在城市的土地所有者，此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环境中，或者直接投资于近代企业，或者是这些企业的热心赞助者，或者倡办各种市政和新式教育事业而成为所谓

^① 孙敬之主编：《中国经济地理概论》，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74 页。

“新派”人物，与资本主义发展相联系，也构成城市上层的一部分。城市上层因为具有传统功名和在经济上占据显要而成为城市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政府与一般市民的中介和桥梁。

与此相对应，为数众多的中下层市民群众成了城市市民等级的主要部分。

近代产业工人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出现，并且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发展着的社会力量。但在 20 世纪初年，中国的产业工人还是十分幼稚的阶级，他们不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因此，在这一时期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同盟军，紧系于城市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链条之上。

城市手工业者、中小商人以及各种自食其力的自由职业者、新式学堂的知识分子，是城镇人群中迅速增大，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影响日益显著的市民成分。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在 20 世纪初年受到外国经济侵略的冲击愈来愈大，遭受到破产的厄运，形成与资本主义发展相联系的劳动力市场的广大后备军。同时，他们又备受封建政府各种苛捐杂税的盘剥，加速了破产过程，因而产生了与封建统治相对立的意识。而各种新式企业、海关、市政机构中的中下级职员及城市学堂、新闻出版机构的知识分子，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兴起的新市民，他们具有资本主义的知识和思想意识，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萌发出改造现状的强烈要求，是市民等级中最敏感的一部分，实际上成为了市民，尤其是中下层市民的代言人。

新军，是中国城市市民等级中特殊而又值得注意的一个成分。新军来源于“士农工商”的“安分子弟”，大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或受业于新式学堂或军校，因而具有与旧式军队官兵

不同的思想意识，更接近于市民。特别是驻防于工商业发达的城镇的新军，目睹身穿着市民社会的心理、价值和生活方式。对他们起着一种潜移默化的心理融合作用。因此，从整体上来说，他们的命运，与城市资本主义发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新军能够在辛亥革命时期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并最终成为发动武装起义的主要力量的原因所在。

从对市民等级的各个层面的考察可以看出，在20世纪初年的城市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并属于资产阶级经济政治范畴的新的社会政治力量。伴随着这个力量的出现，他们与传统的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日渐显著和尖锐，由此而产生了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并推动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市民等级的心理意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压制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变更政治制度、推进资本主义发展，是市民社会心理意识的中心内容。在封建专制社会中，资本主义工商业及从事工商业的市民是受到漠视的，“官与商漠不相关，以商业为个人自谋生计起见，与国家无丝毫关系”^①。市民等级强烈抨击这种观念，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到关系中国存亡的深层来认识，认为要拯救中国，“必自行重商主义始”^②。他们指出：“上古之强在牧业，中古之强在农业，于近世之强在商业。商业之盈虚消长，国家安危系之。”^③ 他们把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重任勇敢地承担起来，“商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富强之基础，我商人宜

① 朱寿明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7—28页。

② 《论中国商业不发达之原因》，《湖北学生界》第3期（1903年）。

③ 《兴商为富强之本说》，《商务报》1905年第8期。

肩其责”^①，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意识。在 20 世纪初年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这种意识便演化成为一种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时代的迫切感：“华商乎，华商乎，其亦念及中国之前途而急起图乎！”^② 而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其意识还表现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要求：“凡立于竞争世界之民族而欲自存者，则当以建民族的国家为独一无二义。”^③ “吾国之不振，……自族不能建立民族国家之故也。”^④ 城市市民等级的这种政治意识，实际上与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相吻合，成为沟通二者联系的思想桥梁。

城市市民等级资本主义意识心理的觉醒，使其与封建专制主义和外国侵略势力的矛盾与对抗心理也日益成为自觉的形态，这就促使了市民等级在组织意识上的觉醒，从而建立起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市民组织形式，以反映市民社会利益和政治要求，这就是在 20 世纪初年出现的各种城市自治机构、市政团体以及市民公社。这些组织中最为普遍的是商会。根据资料统计，从 1903 年至 1912 年，全国城镇设立的商务总会及商务会所达 928 处，拥有会员 20 万人以上。^⑤ 这种情况表明，商会已成为城市市民，特别是工商业者的联合组织形式。从一般情况来看，商会作为城市工商业者的组织，“顾名思义，一以商务为指归”，所从事的活动自然是以讲求振兴、保护工商业为主旨，集中反映城市市民发展工商

① 《兴商为富强之本说》，《商务报》1905 年第 8 期。

② 《东方杂志》第 1 年第 3 期。

③ 《民族主义论》，《浙江潮》1903 年第 1 期。

④ 《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新民丛报》第 11 期。

⑤ 徐鼎新：《旧中国商会溯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 年第 1 期。

业的经济愿望。但近代中国城市工商业发展所处的来自封建的、外国资本的障碍而造成的艰难环境，又必然使商会成为城市市民的政治团体，成为他们抗衡官府、洋商的政治力量的聚集。这就使其能在辛亥革命时期成为市民等级反帝爱国运动和反封建活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城市中，商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市民等级通过它参与城市社会生产和生活以至管理，并力图使其成为清末城市自治的机构，与清朝的封建地方政权争夺地方政治权力，实现对城市市政和社会生活的管理和控制。在一些城市，商会还建立了一系列下属机构，如救火会、体育会、教育会、劝学所、警务公会、拒烟会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州的市民公社，它宣称其宗旨为：“资群策以谋公益，为地方自治团体中之一自治团体者，即我市民公社之原素也。公社以自治为原素，当其组织之始，虽警于宫巷之两火，而实则自治原理，因早为吾人所久蓄而待发也。”^①俨然成为城市地方自治的机构。在上海，也出现了城厢内外总工程师局的机构，以“整顿地方，立自治之基”为指归，^②成为参与城市管理和维护市民利益的机构。

商会的这种发展，自然引起城市地方封建政权的不满，导致二者间的矛盾。实际上，在某些城市，也发生了如同西欧中世纪末城市市民等级摆脱封建统治、争取城市自治和独立的斗争现象。如上海、苏州商会在清末为地方自治机构的设置与控制权而与地方当局发生的矛盾与争执，只是由于中国近代城市封建势力强大，市民等级的这种斗争尚只表现为一种偶然和罕见的现象，

^① 《苏州市民公社档案选辑》，《辛亥革命史丛刊》第4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杨逸等：《上海自治志》，“大事记”，第1页。

并未导致西欧那样普遍的形式和产生独立的城市。不过，它在一定程度上争得了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及市民利益成长的条件。

商会在市民等级中的领导作用，促使他们日益觉醒的政治意识凝集为有组织的流向，变为参与实际政治运动的行动。

1903年的拒俄运动是市民等级参与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起点。当1901年中俄密约签订时，上海市民，特别是商界人士，号召“凡我在申各省官绅士绅均极宜设法”，“以助声势”^①。而当1903年拒俄运动全面铺开时，市民们的自我意识更为清晰，已经明确把救国的重担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来，他们说：“上海一埠，为通商最盛之地，商家住居最繁，……凡我商人，宜发爱国之热情，本爱国之天良……勿失商家体面为要。”^②并且明确地宣布，“凡关系于中国之事”，市民“例得干涉之”^③。在其他城市，如武汉、南京、芜湖等，也出现了市民的拒俄运动。拒俄运动的开展，不但使市民等级增强了参与政治斗争的自觉意识，而且也促使市民等级的一部分，特别是城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开始从改良的樊篱中冲出，接近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这对于此后城市政治运动的发展方向有着重大的作用。

继拒俄运动以后，城市市民等级的政治运动日益发展，特别是抵制美货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是由商会及其他市民团体组织和领导，卷入了整个市民等级的各个层面的城市政治运动，形成了辛亥革命时期市民运动的一个高潮。在这两个运动中，不但是利益关系紧密的城市工商业者踊跃参加，而且市民下层，如工人、小商贩、小手工业主和手工业工人及其他城市劳动者，也成

① 《上海合埠同人公启传单》，《中外日报》1901年3月18日。

② 《中国国民总会知启》，《苏报》1903年5月1日。

③ 《中国国民总会提议各案》，《苏报》1903年5月8日。